

屠格涅夫代表作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三版

——青年文學自修叢書之一——

屠格涅夫代表作

每冊實價八角

編譯者

黃

源



發行者

前鋒書店

上海天潼路裕慶里三弄五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屠格涅夫評傳

一

在俄國的許多文豪中，伊凡·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是最先聞名於國外並為讀者最廣的作家；而且他又是喚起全世界讀者注意俄國文學的功人。但是後來，到了托爾斯泰、陀思退益夫斯基以及其他的許多現代派作家征服了讀書界之後，屠格涅夫的名聲似乎頓時失了魅力與光輝。有人以為屠格涅夫原是不深刻的，他沒有強大的魄力，他的作品不過是單憑美麗的詩趣，以悅青年男女的感傷主義作品而已。然而這是很錯誤的皮毛的觀察。屠格涅夫實際乃是一個最高超的詩人，他能銳敏地觀察理解人生

百般現象可說是「天衣無縫」的完美的表現者，是世界文學界中第一流的天才作家。只因為他是俄國文豪中難得的真正藝術家，他避免露骨的暴露與赤裸裸的分析解剖，而將一切思想感情，包涵於藝術的形象中，採取在藝術的形象中包涵一切暗示一切的態度，所以我們感到他缺乏對讀者大聲吶喊的刺激性。他的作品是用高超的藝術曲曲折折地傳出社會的呼聲，反映出時代精神。當然托爾斯泰與陀思退益夫斯基是無限的偉大；但是我們也該更深刻地理解蘊藏在屠格涅夫的內部的偉大。

二

要理解屠格涅夫的藝術，必先知道他的身世。他以一八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生於中俄羅斯渥爾洛夫烏利爾市的叔父家裏。父親是愛里柴委脫克拉得甲騎兵聯隊的上校，名字叫修爾葛依·尼珂拉歐維奇（Sergoy Nikolayevich），母親名瓦爾瓦拉·彼得洛維娜（Varvara Petrovna）。

瓦爾瓦拉早年喪父，寄居在義父家裏，她因面貌醜陋，生性古怪，所以不得義父之歡。

這不幸的孤兒受盡了難堪的冷笑、侮蔑、虐待。到十四歲時，瓦爾瓦拉不堪這種精神上以及肉體上的苦楚，遂逃至嫡親的伯父家裏。可是她在那裏也得不到一點暖意。她的老伯父一生過慣了任性生活，對於這無所倚賴的孤兒也一點不予寬赦。這位性急的老輩有種三翻四覆的習性，在二十年的長年歲月之間，使瓦爾瓦拉受了不少的苦痛；但到她三十四歲的那年，這位富裕的伯父卻突然害急病逝世了，於是有數千農奴的富裕的領地與萬金之財富，悉落在這位原本一無所有的女人手中。昨天她還被人家虐待凌辱，但至此已一躍為縣內首屈一指的財主，成為許多未婚男子競爭的目標。她就在那當中選了眉目秀麗的美男子修爾葛依為自己的丈夫。但是修爾葛依求婚的動機，原不過是為了錢財打算，所以他對於那醜陋的中年新娘，並不盡他為丈夫者應守的義務。結果以致家庭間時起風波。瓦爾瓦拉受了丈夫的氣，常對自己的兒子加以不正當的憤怒叱責。自從她的丈夫於壯年時逝世之後，她彷彿要急於報復幼年以來所飽受的壓迫與侮辱似的，其橫暴專恣，幾無所限。她往往為了一點無足輕重的瑣事，對農奴婢僕或加以慘酷的體

刑，或遣於兵役，或遠衝於移民部落，毫不顧憐。對孩子們也是同樣，從熱烈的愛情忽而變爲病態的憤怒，發作時常處以殘忍的責罰。此種事實，可見諸拙著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華通書局出版）及屠氏之初戀、蒲寧與伯蒲利等小說中。

在此種狀態生長起來的屠格涅夫，他的心中早已喚起了對於失去自由的農奴之同情，同時因受怪僻的母親之橫暴壓抑，便種下了他晚年的深刻的憂愁的種子。屠格涅夫實在沒有過過稚氣的自由自在的日子。隨着年紀逐漸長大，他對於這種根本不正當不合理的俄國農奴制度，就根本地取了顯明的憎惡態度。二十歲大學卒業後，屠氏去柏林留學；他後來在回想記中這樣說：『我不能和我所憎惡的人在同一空氣中生存一刻。我覺得爲要更猛烈的從遠方攻擊敵人，便有稍些離開一刻敵人之必要。這仇敵在我眼裏有一定的形式，有一定的名字：這敵人是誰——便是農奴制度。』對於這仇敵始終不妥協，盡全力鬥爭，那便是他的終身誓言。

屠格涅夫在二十五歲時結識了俄國的大批評家白林斯基（Visserion Belinsky），

因而一生受到他不少的感化。一千八百三十年代，是白林斯基在俄國文壇上活躍得最凶猛的時代。這時代的文壇，都是以白林斯基一派的色彩染成的。白林斯基的評論，是當時俄國思想界的中心點；是俄國智與情的百科全書。他捉住了與那時代的知識份子有關的一切東西，而努力給人們以一切難題的解答。因為他希望把自己憧憬理想所嘗到的真苦痛而得來的結果，以燃燒似的熱情傳授給人家，因此在他的評論的根柢裏，常有一種幾乎可稱為閃耀當時之神經的理想觀念。這便是他的評論之所以能在文學界別開新生面獨成一派的緣故。他是俄國文學之公明正大的勇士，又是俄國思想界之殉教者……屠格涅夫有了一位這樣的朋友，實在是很幸福的。屠氏的青年時代有很多的缺點，那便是所謂俄國人特有的怠慢、不負責、以及放縱等等。例如借了錢到期不還；別人盼望得很急切的信，他卻置之不覆；不履引約束；幹無用的照應——凡此種種，都是俄羅斯貴族派的惡習。屠格涅夫也不是例外。白林斯基對他幾若父執一般，往往指摘着這些缺陷來責備他。白林斯基的偉大的肖像成了屠格涅夫一生的明星，對他顯示着將來該

走的路途。所以有人以爲：若是屠格涅夫不與白林斯基相交，恐怕他文學上的收穫不會有這樣的偉大。

屠格涅夫成年以後的生涯，可說是在來往於外國與俄國之間過去了的。而且在外國的時間更多，尤其是法國。實際上法國可說是他的第二故鄉，甚至臨終也在法國。如左拉、福羅貝爾、都德等文豪，都是他的莫逆之友。但是所以他特別留戀於法國的重大原因，乃是他的戀人——歌女維阿爾特（Pauline Viardot）。有一次，維阿爾特隨着歌舞劇團來彼得堡；屠格涅夫在那時認識了她，此後即以全生命傾愛于她。維阿已是有夫之婦，在故鄉已成立了暖愛的家庭，屠格涅夫就成了她全家的友人，與維阿爾特繼續着清交，而獨身過了一生。他雖把無報酬的愛情秘藏胸中，但是那備嘗天涯無家的孤寂，已可在他的書簡中窺其端倪，而在浮士德、尺素書等作品中，亦有明顯的暗示。

三

屠格涅夫的處女作，是他二十五歲時發表的敘事詩巴拉喀（Paracha），但這還是

他未曾真正發見自己之路以前的摸索時代的作品，所以要檢討屠格涅夫之藝術的主要的過程，當以獵人日記爲出發點。獵人日記是二十五篇描寫俄國農村生活的短篇小說集，其第一篇霍爾與喀里涅奇（Kor and Kalinitch）發表在現代雜誌上時，作者自身以及雜誌的編輯者都夢想不到這篇短短的小說竟能在俄國文學史中，而且又在俄國的社會生活中演了重大的任務。這作品作者祇用自己名字的縮字署名，編輯者也不把它編在創作欄而編在雜錄欄中。但這短篇卻意想不到的引起了識者的注意，致成爲文壇全體的話題。

霍爾與喀里涅奇在今日的讀者看來，也許是無足爲奇的。當然，在藝術上那雖可說是一篇有味的短篇，但終不過是一種隨筆的文章。那末何以這短篇會轟動一時呢？那無非是其中所表現的對於農民的態度。當時在俄國，農奴制度的問題早爲先覺者研究，議論之對象，自覺的知識階級所負的任務便是把農民從重軛中救出來；但他們以爲農民的本身是一種蒙昧無知半獸狀的存在，從沒有想到這可以做文學作品的題材。本來如

四十年代雖已有格里哥洛維奇 (Grigorovich 1822—1899) 的鄉村等的作品出版，但其中所描寫的農民，只是成了憐憫的對象，看不出一點人性的面目。而以屠格涅夫爲始，纔把俄國的農民寫成才能睿智，感情纖美，和靈魂純潔的人物出現於讀者之前。在他的作品中沒有像格里哥洛維奇作品中見到的那種不自然的誇張與咏嘆的感情。他完全守着沈靜的寫實手法，在那底裏包涵的，唯有真正的藝術家所能看到的溫暖的同情。——這幾點便是在當時的俄國值得驚異的唯一的新現象。

因爲霍爾與喀里涅奇獲得特殊的成功，頓使那時懷疑自己的才能而欲拋棄文學事業的屠格涅夫，重新提起精神來。他傾其自幼積蓄着的知識與觀察，繼續寫了許多農民小說，遂在一八五一年巴黎近郊的旅寓中集成獵人日記全部二十五短篇。這書的出現，使所有有良心的俄國人，更痛切地感到農奴制度之可惡的本質，大家都知道那久未解決的農奴解放該到了實現的時期了。俄皇亞歷山大二世，當時還是皇太子，他曾說：『對於這種問題，本來幾乎是全不關心的，可是如今一讀獵人日記，覺得農奴必須解放的』

念頭，寸刻也離不開腦子。』

但是獵人日記決不是以政治宣傳爲主的作品。屠格涅夫天性柔和溫良，他不能取這樣露骨的驕激的創作態度。他雖如實地描寫被不正的社會組織所虐待而陷於黑暗悲慘的非人生活的農民，同時他卻有業經洗煉的藝術家的直覺，而以外表粗剛的農民之美麗的特性以及帶有詩趣的憂鬱感懷的自然爲背景，予以啓示。實際上，他的缺乏露骨的反抗，反能增加他作品的反抗力。

白靜草地 (Byezhin Prairie) 中少年之純潔的詩魂，霍爾與喀里涅奇 中喀里涅奇之藝術家的素質，活屍 (The Living Relics) 中爲地主家之男僕遺棄的可憐的少女——我們若把這些與同集的兩地主中描寫的空疎淺薄的生活一相比較，那末在農奴與地主的評價上，怎不使人痛感到一變從來的標準是何等焦眉之事呢！

獵人日記完全包含着屠氏創作的特質。他的藝術的進程可說完全是由這作品決定的。

四

獵人日記以後，屠氏的作品所遭遇的共同運命，是兩種極端相反的批評。他的長篇小說中，從批評家方面得到一致讚美的，唯有貴族之家一篇，其他各篇，沒有不成爲劇烈辯論之對象的。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那無非是因爲這些作品都觸到支配那時代的人心之中心問題，而批評家都是單從思想方面來看作品的。屠格涅夫是個有高教養的思想家，又是敏感的藝術家，對於支配一般社會的時代風雲，他決不會毫不關心。從而他雖常選政治社會的題材；但是因爲屠格涅夫是富有詩人與藝術家的氣質的，所以在他作品中所表現的社會問題，往往缺乏如火般的热情，而帶着冷靜客觀的批判性質。因爲作品全體的重心是在於生活現象之藝術表現，以及各個人物之心理描寫；社會問題不過是悠久的人生現象之一，所以作者就將此溶入於偉大的全體之中。總之單是從思想方面的觀點來批評一切綜合各種精神活動之藝術，是非常不妥當的。

屠氏的第一長篇羅亭，其主人公羅亭是一個熱心於正義，富有動人的雄辯而缺乏

意志力的實生活之無能者，是一個畸零人。作者以四十年代墮於空論的理想主義的知識階級爲典型，寫成此藝術化的名作；但是這篇並不能博得全文壇一致的讚賞。據說羅亭是以青年時代革命家巴枯寧爲模特兒的，作者雖則煞費一番心力描寫雄辯家情熱家的巴枯寧，可是終失去其社會的政治的的信念，以及伴着那信念的特性，於是引起了種種非難。有的批評家非常憤懣，以爲羅亭雖則由作者予以偉大的社會使命，但若以此爲四十年代知識階級之代表，則未免太淺小虛弱了。別的批評家以爲這小說的缺點在於以戀愛事件爲中軸，而不描寫羅亭之與複雜多面的現實的鬥爭。當然在這小說中，當代的思潮也演了重大的脚色，並且它是由作者的可驚的技巧很巧妙地織在故事中的；可是橫在那根底的，還是那生動個性之創造和心理表現之問題。

羅亭出版後三年，於一八五九年便出版了貴族之家，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是屠格涅夫唯一的從各方得到讚辭的長篇；屠氏之藝術的成熟，可由這傑作全無遺憾地證明出來。貴族之家的女主人公里莎，本來以爲其戀人之妻已死，不料忽又見她自外歸來，於

是里莎就斷然排斥男子的懇切的哀願，把熱烈的情火葬之於冷靜的尼庵中。蘊藏着如此強烈的宗教純情的處女里莎，是完全現實化的永遠的理想女性，不禁令人起感激與敬虔之念。雖然羅亭中的娜泰芽，已是屠格涅夫用了特殊的魅力所描寫的女性，很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到里莎就達到頂點了。

男主人公拉夫爾斯基雖屬於常出現於屠氏作品中之人生失敗者、畸零人的典型，但他要把在個人方面、家庭方面失敗的生活餘力，用在農民間的質朴的勞動方面，從這點看來，他已比原來的「畸零人」型進步一點了。不但此也，屠氏賦這拉夫爾斯基之宗教的謙抑，對祖國深切的感性，對民間真理的認容——凡此種種特性，由站在西歐派立場的屠格涅夫看來，是很難得的。這一點，我們大可以視為畸零人之回復於實生活，國民精神之抬頭，一切因迫於農奴解放而呈現出來的高潮，以及一般社會生活之光明氣分之反響。

屠氏寫了貴族之家以後，便一變其向來的態度，努力忠實地迅速地活寫年年在

推移變遷的俄國各時代，所以自前夜至處女地的四大作品，便是描寫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社會風潮的作品。翌年，屠氏便完成了第三長篇前夜。這篇將俄國社會醞釀着自由的期待之情，很顯明地表現了出來。事實上，農奴解放令卽在翌年一八六一年頒布，所以屠格涅夫用前夜之題名，可見其藝術之直覺的銳敏。但是他把俄國國民對自由之翹望，用原本的形式藝術化了。那同情於祖國獨立運動而奮鬥的巴爾幹人般沙洛夫，熱情於偉大的全人類的事業而拋棄了家庭，飄泊於異鄉的葉林娜，才是當時俄國知識階級之期待，熱望，與焦躁之象徵。屠氏之所以將政治的社會的問題寄托於一個少女的戀愛事件，這種帶着抒情的手法雖則是他藝術上必然的傾向，但同時也是避免當時嚴重的檢閱壓迫之法門。

這小說一出版，頓時遂流入喧擾的爭論與惡罵之中。在年輕的大學生、文人學士之間，雖博得嘖嘖的美評，但那些上層社會的人們，他們正期待着極輕便的改革，如今看到這長篇中所表現的革命肯定氣分，就感到異常的不安與驚惶。一聽到『這「前夜」決不

會看到「明日」的警句，便能想像到隱在底裏的不安與恐怖。從道德方面所受的非難，更爲嚴重。在所謂良家的家庭裏，把勇敢而毫不踟躕地解決了戀愛與婚姻問題的葉林娜，稱之爲下流的不良女性。傳聞某批評家爲要對這小說施以峻嚴的詰難，甚至從有志的人們收集論文，特開記念宴會。但是托尔斯泰卻推稱這小說說：『在當代能寫這樣小說的，除了屠格涅夫更有何人！』

屠格涅夫的前夜出版後，他便傾其全力寫父與子，此書於一八六二年發表。如這小說之流行於社會的範圍之廣，引起劇烈的贊否辯難之暴風雨者，幾不知更有他例。作者給主人公巴扎洛夫的虛無主義的稱呼，成了帶着不吉的威嚇似的新流行語，口口相傳，頓時廣佈於俄國全國。

父與子發表時，批評界對這小說的態度是很奇怪的。全然相反的兩營陣同時對這作品加以攻擊。代表舊時代的保守派，以爲屠格涅夫崇拜作中的虛無主義者，愚弄嘲笑舊的傳統世界，因此非常憤激。進步派的青年卻把主人公巴扎洛夫解釋爲對新時代之

諷刺畫，甚至痛罵他是「自由理想之奸細。」巴扎洛夫是以批評家陀勃羅留波夫（Dobrolybov）爲模特兒的，作者因對這批評家抱着反感，於是更以冷譏的態度寫之——這是坊間流行的謠言，這話真叫青年派的憎恨火上加油。

父與子受舊時代人們的憤激，乃是當然之事，無足爲奇。巴扎洛夫是一個冷靜的自然科學者，極端的物質主義者；富有久經洗煉的藝術趣味的屠格涅夫，對此人物感到深深的內心牽引。人們對於自己所缺乏的性格傾向，往往會發生這種牽引與愛慕之情。屠氏寄愛於巴扎洛夫所有的野性的盛力，描寫出一個偉大肯定的人物來。從而對前時代的人們——父輩——予以較多的否定的陰影，可說是自然的結果。

但是屠格涅夫並不把自己描寫的人物，完全理想化而成爲完全人。他把巴扎洛夫代表了新時代的人物，而不認他有建設的熱情；他雖具有銳利的解剖力與批評眼光，但這些豐富的精神，單是集中於消極的否定，對於明確的社會活動是沒有一點理想，沒有一點目的。並且他不僅冷笑爲改革社會秩序而努力着的人們，且甚至對於形成他們